

了改变,文本样态和内容都未变动,只是从一部纸介图书转变为另一部纸介图书,并未给被影印的古籍增添任何附加值。若单纯为保存古籍内容,将其转化为数字化文献,效果或许更佳。

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《古逸丛书三编》绝大多数是宋代刻本,主要编选宋元旧刻中的珍本以及海内外孤本古籍,按照正编、续编的方式以线装形式影印,力求最大程度保持原书面貌,以便广泛流传。它既能为专业人员提供研究参考,也能让读者从中了解古籍装帧形式,以及宋元善本的形制、款式和书体等内容。这套丛书所选书目的底本,均经过国内目录版本学家严格审定,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版本价值。其中收录的南宋杭州刻本《忘忧清乐集》、南宋孤本《金石录》和国内仅存的宋绍兴残本《大唐六典》等,都是极具价值的珍贵古籍。

二、数字化。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,古籍出版形态和阅读形态日益多元化,古籍数字出版已成为必然趋势。全国图书馆珍藏的古籍,应当由国家进行统一规划,分重点、分先后、分批次开展统一出版工作。这样做既能确保古籍数字化过程有条不紊地进行,又可防止在转化过程中因古籍使用不当而造成损坏,同时还能节省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,避免对20万种古籍进行重复数字出版。

此外,数字出版还涉及纸介古籍和数字古籍的珍藏问题,这同样不容忽视。应妥善保存数字古籍,尤其是孤本,省级图书馆更应做好

相关保存工作。

古籍整理工作的核心在于深化整理与出版,这一点至关重要。我们应运用现代人的思维视角和研究方式,深入挖掘古籍的当代价值,让古籍服务于现实社会,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然而,由于不同语体、语境以及历史时空的差异,让古籍为现实服务并非易事。因此,我们在进行古籍整理时,必须秉持足够的敬畏之心,切不可急功近利,盲目追求规模与速度。否则,不仅无法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,反而可能出现误传误导的情况,对公众产生不良影响。此外,古籍本身质量参差不齐,精华与糟粕并存。所以,如何去伪存真、去粗取精,成为古籍整理工作中的关键环节。

在古籍整理领域,中华书局组织点校出版“二十四史”的举措,为行业树立了极为优秀的典范。“二十四史”系统且权威地记录了我国历史,是浩如烟海的中华古籍的核心部分,拥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。

历史上,史书的修撰刊刻向来是国家大事。1958年,毛泽东主席指示开展点校“二十四史”的工作。1971年,周恩来总理作出批示,明确由顾颉刚先生负责“二十四史”的点校事宜。随后,中宣部、教育部正式向全国各重点大学,如北京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山东大学、吉林大学、南开大学、杭州大学等发文,邀请古籍专家齐聚北京参与点校工作,这些专家分批前往北京开展点校。第一批参与点校的专家有郑天挺、刘节、唐长孺、王仲荦、罗继

祖、王永兴等。此后,又陆续邀请了几批人员参与。启功先生参与点校“二十四史”时,相较于其他老先生,年纪较轻,属于晚辈。最终,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于1978年全部出版发行。

除了“二十四史”,《资治通鉴》的编纂与出版同样意义非凡。中国历史上,有两部举足轻重的史书,一部是司马迁所著的《史记》,另一部便是司马光主编的《资治通鉴》。1953年,毛泽东主席指示范文澜组织力量对《资治通鉴》进行点校工作,点校任务于1956年圆满完成,随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。除了史书之外,中华书局还广泛组织全国专家学者对其他经典文献进行校对整理。其中,文学类有《全唐诗》《全宋词》,哲学类有《新编诸子集成》等。

此外,中华书局汇聚了一批国内外文史哲领域的名家,对古籍中的经典名著开展注释与翻译工作,如《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》。这套丛书中的诸多著作,已成为当今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。中华书局出版、杨伯峻译注的《论语译注》,陈鼓应译注的《老子译注》,沈玉成先生翻译的《左传译注》等,这些书籍都在古籍整理领域树立了标杆。

如此高质量的古籍整理工作,对传播中国古籍与传统文化功莫大焉。正是这些精心编制的标点本、注释本、译文本,有力地推动了中华古籍在现代社会的广泛传播,充分彰显出古籍的现代价值。☞

(作者系中华书局原总经理兼党委书记)

本文责编/陈慧 邮箱/171661049@qq.com